

道莫盛于趋时

——新中国伦理学研究 50 年的回溯与前瞻

王泽应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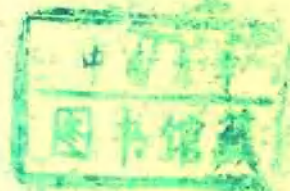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资助项目 (07BZX034)

道莫盛于趋时

——新中国伦理学研究50年的回溯与前瞻

王泽应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莫盛于趋时 / 王泽应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2

(潇湘学者丛书第1辑)

ISBN7 - 80145 - 564 - 9

I. 道… II. 王 III. 伦理学—研究—中国—当代 IV.D8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53799 号

道 莫 盛 于 趋 时 ·

——新中国伦理学研究 50 年的回溯与前瞻

王泽应 著

☆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 100050

※

850×1168 1/32 印张 13.5 字数 380 千字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册

宏图彩印厂印刷

ISBN7 - 80145 - 564 - 9 / D·35

定价: 40.80 元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伦理文化发展史上壮丽的日出	(15)
一、涤荡污泥浊水,批判旧的伦理	(16)
二、毛泽东伦理思想的发展与主流伦理的确立	(30)
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主旋律的弘扬	(50)
第二章 道德研究领域的耀日疾风	(69)
一、共产主义人生观道德观的探讨与论争	(70)
二、人道主义的讨论与对抽象人道主义的批判	(83)
三、道德遗产批判继承的讨论波澜四起	(93)
第三章 伦理生活天空的遮云蔽日	(114)
一、道德观上的批吴倒刘风起云涌	(115)
二、个人崇拜伦理、斗争伦理和禁欲主义伦理甚嚣尘上 ...	(127)
三、孔子和儒家伦理文化遭受空前厄运	(138)
四、不屈的抗争与正义的呐喊	(148)
第四章 伦理暴风雨过后的云开日朗	(159)
一、改革开放与邓小平伦理思想的形成	(160)
二、深化改革与江泽民对邓小平伦理思想的发展	(178)
三、两大精神文明建设决议中的伦理思想建树	(199)
第五章 伦理文化研究的日升月恒	(211)
一、中国伦理思想研究的巨擘——张岱年	(211)
二、共产主义道德问题研究的专家——周原冰	(223)
三、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的奠基人——李奇	(233)
四、伦理学学科建设的开拓者——罗国杰	(241)

第六章 如日中天的伦理学理论、历史和应用研究	(256)
一、突破创新的伦理学原理研究	(256)
二、全面精进的中西伦理思想史研究	(276)
三、喷薄欲出的应用伦理学研究	(285)
第七章 夸父逐日的伦理学追思	(304)
一、筚路蓝缕的发展历程	(304)
二、卓越的成就与存在的问题	(316)
三、追寻太阳的体会与启示	(332)
第八章 东方的太阳与中华伦理的伟大复兴	(348)
一、伦理学基础理论发展的特质和趋势	(349)
二、中国伦理文化的深度发掘和现代弘扬	(360)
三、西方伦理文化的理性对待与科学借鉴	(371)
四、应用伦理学的全新发展与高潮迭起	(380)
结束语	(414)
附录:主要参考文献	(417)
后记	(422)

前言

时间本身的流逝是平凡而均衡的,但人类生活的时间却有着某种不平凡和非均衡的因素,特别是将时间纳入价值和意义的范畴来关照尤其如此。人类生活的有些时间是平静而缓慢的,有些时间则是风云翻卷、波澜起伏的。经过客观存在意义上的时间本身的筛选而存留于人类文化史上的某些特定时间段或时空区域,常常构成人类文化和历史记忆深处的永恒。就人类伦理文化史的发展而言,也是这样。人类伦理文化史的发展并不是平铺直述的时间绵延,而是且常常是高低不平、此起彼伏的,其中不乏惊心动魄的内容和高潮迭起的情节。伦理文化史作为记录人类认识自己和天地万物关系的心灵发展史,总体上看同人类的社会活动和价值选择密切相关,体现出既“与时俱进”又引领和改造时代的独特功能,形成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时间流逝的非线性发展线索,充满着历史的曲折和发展的不平衡,因此必然是高潮和低潮相互激荡的历史。

人类的伦理文化发展史,最富有丰富记忆内容并且常被后人感叹、钻研的,往往是伦理文化的转型和新伦理文化创造的关键时期,是产生了博大而深刻的伦理思想并因此改变或提升了人类的道德生活的特别时期,是伦理文化风云际会、继往开来的伟大世纪。古希腊的伯利克里时代、亚历山大时代,中世纪后期的文艺复兴时代,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启蒙时代,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汉唐时代、宋明时代、五四时代以及改革开放时代等都可谓人类伦理文化重要而特别的发展时期。这些时期的伦理思想不仅在理论的攀升上达到了相当的高度,而且在实际的生活中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陶铸或改变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道德心灵,在人类伦理文化发展史上矗起了一座座棱角分明的高峰,让世人“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立于人类伦理文化发展的奥林帕斯山上,俯瞰数千年人类伦理文明的发展、传承和演变的一道道独特景观,我们或许要把目光集聚在刚刚过去的 20 世纪。20

世纪是人类伦理文明的创世纪。伦理学因激荡澎湃的社会生活而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契机,不仅形成了系统的规范伦理学、严谨的分析伦理学和丰实的描述伦理学,而且产生了许多为其它世纪闻所未闻的伦理学新学科,如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学、空间开发伦理学、计算机网络伦理学、基因伦理学等等。20 世纪的中国伦理学是 20 世纪人类伦理学殿堂中最引人注目也最有民族特性和时代特征的伦理学。五千年悠久文明的中国直到 20 世纪才真正产生了独立化、系统化的伦理学,也就是在 20 世纪,中国伦理学立于民族伦理的深厚土壤和应对世界伦理的大环境,完成了伦理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历史转型,以及追赶世界潮流,全面发展伦理学各个学科的任务,并且还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伦理文化建设的卓越成就彪炳于世界伦理文化之林。

20 世纪中国伦理学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界,可以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 50 年的伦理学主要是民族民主革命时期的伦理学,它在救亡图存和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情势中出生并伴随救亡图存和中国向何处去的时代情势一道前进,形成了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全盘西化论伦理思想,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蒋介石伦理思想,和代表无产阶级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即毛泽东伦理思想。经过时代的大浪淘沙和人民的理性选择,中国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在与其它各种思潮的斗争中最后取得胜利,并成为后 50 年伦理思想的主线和主流伦理。后 50 年的伦理学主要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伦理学,巩固政权和建设新中国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获得在社会生活中的支配地位,在经历自己的曲折发展后终于在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走向全面复兴和发展;与此同时,创建有中国特色的伦理学原理新体系,发展中国伦理思想史学、西方伦理思想史学及社会主义性质的应用伦理学各学科,并为中华伦理文化伟大复兴创造条件。这是一个社会主义伦理文化从形成到发展并在发展中走向振兴的激荡澎湃的历

史时期,是一个对社会主义伦理文化探讨和创造并在创造中走向成熟的令人感奋的历史时期。新中国 50 年的伦理学尽管经历过特有的曲折,在历史的长河中仅以时间计也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但它确实又是无法用时间来衡量的 50 年,它在中国伦理思想史上所产生的波澜足以让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刮目相看,也许我们说它相当于历史上的几百年或一千年,也许还不止一千年。

新中国伦理学 50 年的发展是 20 世纪中国伦理学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五千年中华伦理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当代世界伦理文化的重要一脉。短短 50 年的新中国伦理学虽然历尽沧桑,但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而辉煌的。拥有五千年悠久伦理文化传统的中国直到 20 世纪初才真正产生了理论化、学科化的伦理科学。然而,20 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伦理学本质上是草创时期的伦理学,再加上中国外受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侵略,内受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买办资本主义的压迫剥削,以及连绵不断的战火与民族苦难,使得伦理学的发展困难重重,表现为研究人员短缺,研究条件和研究资料也十分有限,取得的成果不多且大多停留在翻译介绍西方的伦理学和对中国传统道德的粗疏解释上。而代表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全盘西化派伦理思想,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现代新儒家伦理思想,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伦理思想也因为不能正确认识中国革命的发展趋势和前途,在道德上陷入了中西古今之辩的泥潭之中,要么仇视民族传统道德醉心西方近现代道德,要么仇视西方近现代道德崇尚中国传统道德,故都不能把握中国革命的道德要求和人民的道德心声,不能也无法引领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新潮流。只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中注重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道德实践相结合,用心思考着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大趋势,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颇具真知灼见的伦理学理论和思想,并使中国革命在价值目标和伦理动因方面获得了最广泛的民族认同和精神支持,推动了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和最后取得胜利。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获得了支配性和主导性的地位,

共产主义道德由革命根据地的道德而走向全国,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从而开创了中国伦理文化发展的新纪元,中国伦理文化由此揭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

新中国伦理学 50 年是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战胜其他非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而获得巨大发展的 50 年,是致力于共产主义道德研究和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 50 年,也是伦理文化除旧布新、革故鼎新的 50 年。在 50 年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对一切非马克思主义、非社会主义的伦理思想,特别是封建主义道德观念和资产阶级道德观念展开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对抽象人性论和人道主义也给予了严厉的声讨和谴责,使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日益深入人心,并成为大多数人的行为指南,开创了中国道德史上至今仍令人感奋不已的黄金时代。在 50 年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道德实践相结合,出现了两次大的理论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伦理思想和邓小平伦理思想。这两大伦理思想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实现了中国化的伟大转化和中国伦理文化的马克思主义化,它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新道德的核心,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功利主义或社会主义功利主义为主要的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或爱社会主义为基本的行为规范,主张发扬大公无私、诚实守信、谦虚谨慎、勤劳勇敢、实事求是的道德精神,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树起了新道德的旗帜。毛泽东伦理思想和邓小平伦理思想在全社会的大普及,使中国社会的道德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伟大变化。

在 50 年的发展历程中,党和政府十分注重对旧道德的批判和对新道德的建设,利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手段来解决道德生活领域里的问题和为新道德鸣锣开道,先后颁布了多项与道德建设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文献。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两次专门讨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会议,对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了全面的部署和研究,形成了两大决议,即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和十四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这两大决议对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作了精辟的论述,明确了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宗旨、任务、方法、内容和措施,给伦理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和要求,将新中国伦理学的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和水平,为新世纪开展全民族的公民道德建设,迎接世界伦理文化的挑战奠定了精神文化的基础。新世纪之初,中共中央又颁发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继承并发展了两大决议中的伦理思想,对我国新时期公民道德建设的形势和任务,基本原则和指导思想,主要内容和建设措施等作了科学的分析和全面的部署,使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进入党和国家决策的重要位置,并成为全民族的一种价值共识。

在 50 年的发展历程中,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获得全面的发展与普及,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周原冰、李奇、张岱年、罗国杰等人对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学科体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唐凯麟、魏英敏、章海山、许启贤等对发展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体系也多有建树。与此同时,广大伦理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原理、方法为指导,开展中国伦理思想史和西方伦理思想史的研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伦理思想史学科和西方伦理思想史学科,推出了不少填补空白的学术著作。在建设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原理和伦理思想史学的基础上,我国伦理学工作者面向道德生活的具体实际,卓有成效地开展各种应用伦理问题的研究,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应用伦理学及各应用伦理学的分支学科。目前,中国的伦理学学科不断地孕育和孵化出许多新的学科,成为一个庞大的学科群,显示了同社会生活和科学技术密切结合并渗透其中和指引其发展的巨大效能。一个伦理学的时代和伦理学发展的新时代已经到来。伦理学在整个社会的物质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建设合乎社会主义新伦理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体系成为大多数人的价值共识。时代和社会已发展到一个不重视伦理学就不能更好地发展自身的阶段。

新中国伦理学 50 年的发展历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初创时期、经受严重挫折的时期、恢复时期和发展

繁荣时期。第一阶段自 1949 年至 1965 年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学科的奠基和初步发展时期。虽然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在解放以前的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有一定的传播,毛泽东、刘少奇等人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伦理思想,创立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毛泽东伦理思想,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并未上升到国家意识形态的主导和支配地位,其传播的范围和影响也有限。新中国的成立,为确立马克思主义伦理思想的指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共产主义道德从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一跃而为国家占主导地位的道德体系,获得了在全社会推广宣传的政治文化条件。50 年代初,虽然将伦理学作为一门旧的学科予以取缔,并展开了大规模的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伦理道德的批判,但广大人民群众高涨的共产主义道德热情及其所产生的新的道德风尚,为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或道德科学的研究与宣传提供了极好的条件。1950 年 1 月,杨甫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文章,论述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的新道德观,对《共同纲领》中所提出的国民公德予以具体的解释和界定,并认为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公共财物即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最具体的表现,也就是人民的新道德的表现。于光远的《新中国与新爱国主义》,萧德的《论中国人民的新爱国主义》等文则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新爱国主义的内涵、本质和特征作了比较全面的分析论述。50 年代初,一些学者还就共产主义人生观、动机与效果以及个人与集体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随着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完成,50 年代中后期开展了对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人生观的系统研究。1955 年吴江出版了《共产主义道德问题》一书,系统地阐明了什么是共产主义道德和共产主义道德的作用,论述了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方法,并对剥削阶级的道德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同年,周原冰出版了《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一书,专门就如何在青年中培养共产主义道德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江陵在 1955 年《新建设》5 月号上的《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一文则探讨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特点、内容、规律和方法诸问题。此后,从理论与实践两个角度探讨共产主义道德的文章不断增多,总的趋势是强调共产主义道德的先进

性及其同一切旧道德的本质区别。50年代中后期至六十年代中期,随着对旧道德批判的加深和对共产主义道德宣传的加大,伦理学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并在学术上展开了对人性论人道主义的讨论,对道德遗产批判继承的讨论,以及对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理论基础及特征的讨论,一些报刊还专门开展了幸福观、荣辱观、婚恋观、职业观、人生观等的讨论。李奇、周原冰、周辅成、张岱年、冯友兰、吴晗、冯定以及罗国杰、许启贤、冯其庸、李光耀、郑文林、王熙华等人均参与了当时的讨论,他们纷纷撰文或出版著作,陈述自己对道德遗产批判继承问题和人性论人道主义等问题的看法。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张岱年《中国伦理思想发展规律的初步研究》,周原冰的《道德问题论集》,冯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以及周辅成编的《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中国科学院哲学所编辑的《道德遗产批判继承问题讨论集》等。应该说当时伦理学领域里的讨论总体上是学术论争,有助于伦理学理论研究的深化和学科的繁荣。但也需要指出,由于受当时政治氛围和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讨论中存在着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和对不同意见上纲上线予以批判的思想倾向,使伦理学的客观理性研究和深入研究面临着相当的困难。

第二阶段自1966年至1976年是伦理学研究遭受严重挫折、完全被政治斗争所取代的时期。文化大革命初期以批判吴晗的道德论和清官思想为重点,将其道德论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与此同时对邓拓的《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与围剿。继之是全国范围内的“破四旧、立四新”和“造反有理”、“斗私批修”运动。随着运动的升级,与红卫兵大串联相伴随的一方面是砸烂封资修的黑货,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打倒地富反坏右,将一切关心个人利益的思想和行为完全视为封资修的黑货予以无情的批判与打击,“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成了当时最流行的口号,另一方面是大搞个人崇拜,把领袖人物神化,“三忠于”、“四无限”和“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唱语录歌”等活动将人们推向对领袖人物无限痴迷的道德神秘主义之中,“顶峰论”、“救星论”一时沸沸扬扬,在全国各地革命委员会竞相成立的日

子里,这种痴迷达到了最高峰。文革时期,“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唯成份论十分猖獗,“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以及否定智慧、否定思想、否定个性的道德愚昧主义甚嚣尘上,富裕成了道德败坏道德堕落的象征,贫穷则成了光荣和革命的标志,对经济与道德、文化与道德、知识与道德极尽曲解,“卫星上天,红旗落地”的鼓噪盲目而热烈。与此同时,对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予以彻底批判和抛弃,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的伦理道德在感情上仇恨和蔑视,在学理上排斥和轻视,将马克思主义同人类以往的伦理文明截然分割对抗开来,使马克思主义变得面目全非。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把 50 年代后期以来的左倾错误发展到极端,不仅造成了伦理学的停顿与扭曲,而且造成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混乱和道德危机,教训十分深刻。需要指出,尽管十年文化大革命伦理学处于严重扭曲和停顿的状态,但仍有不少人在关心着中国社会的道德发展状况,他们以各种方式同林彪、四人帮的道德愚昧主义、禁欲主义和反伦理文化的观点进行斗争,遇罗克、张志新对唯成份论的批判和对真理正义的追求,以及相当一部分正直的工人、农民、军人和知识分子对道德愚昧主义、禁欲主义和反伦理文化思潮的抵制和不满,为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伦理文化浩劫奠定了社会心理和思想文化的基础。

第三阶段自 1977 年至 1991 年是马克思主义伦理学获得恢复并得到初步发展的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面对当时思想文化领域里“万马齐喑”的局面,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特别关心我国人文社会科学事业包括伦理学的恢复和发展。随着拨乱反正和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展开,伦理学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中逐步得以恢复。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的召开,果断地决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把党和全国工作的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也为伦理学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政治基础并提供了可靠保证。1979 年中国人民大学恢复并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之后北京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相继组建了伦理学教研室或研究室。中国人民大学受国家教育部委托举办了几期全国伦理学教师培训班。1979 年李奇的

《道德科学初学集》一书出版,该书收集了十余篇她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所写的伦理学方面的学术论文。该书连同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人民大学校内用书)成了70年代后期重要的伦理学著作。1980年于全国人生观讨论初步展开的时令在江苏无锡召开了全国第一次伦理学讨论会,25个省市自治区的150多名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成立了中国伦理学会。中国伦理学会的成立,为恢复伦理学的研究和展开伦理学的学术交流提供了组织保证。1982年,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唐能赋、唐凯麟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原理》二书相继出版。罗国杰主编的《马克思主义伦理学》是新中国第一本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的教科书,建构了一个以道德与利益的关系问题为基本问题,以道德基本理论、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实践为组成部分的伦理学结构体系,并把社会主义道德原则规范体系界定为一个原则(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原则)五条规范(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和爱护公共财物)四个范畴(义务、良心、荣誉、幸福)和两个特殊方面的要求(爱情婚姻家庭道德和职业道德)。之后适应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需要,伦理学教科书的编写如雨后春笋般地生长发展。其中有代表性的有魏英敏、金可溪编著的《伦理学简明教程》,张善城编著的《伦理学基础》,张培强、陈楚佳主编的《伦理学概论》等。老一代的伦理学家如张岱年、周辅成、周原冰、李奇、朱伯昆等也重新焕发出学术青春,相继推出了一批学术专著,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学术论文。如张岱年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朱伯昆的《先秦伦理学概论》,周辅成主编的《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周原冰的《道德问题丛论》和《共产主义道德通论》,李奇的《道德与社会生活》和主编的《道德学说》等著作推动了伦理学在恢复阶段的传播与发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由农村向城市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建设使中国社会的道德面貌和人们的道德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问题新事物不断涌现,伦理学家们跟随时代的步伐一道前进,纷纷撰文或著书探讨改革开放所引起的道德变化以及商品经济与道德建设的关系问题。与此同时,对中国传统伦理文化和西方伦理文化的研究也在全面地展开,出版了一批中国伦理思想史和西方

伦理思想史的著作。中国伦理思想史方面,陈瑛等著的《中国伦理思想史》,沈善洪、王凤贤合著的《中国伦理学说史》以及朱贻庭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等可谓这一时期的代表著作。西方伦理思想史方面,章海山的《西方伦理思想史》,罗国杰、宋希仁合著的《西方伦理思想史》(上下卷),石毓彬、杨远合著的《20 世纪西方伦理学》,万俊人的《现代西方伦理学史》等著作在向国人介绍传播西方伦理思想方面作出了较大贡献。这一时期,伦理学学科建设也在一批老中年学者的带动下有序地进行,招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的工作得以顺利展开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基本上形成了一支结构合理阵容壮观的学术队伍,为伦理学在九十年代的繁荣和勃兴奠定了基础。

第四阶段自 1992 年至 2000 年是新中国伦理学获得飞速发展,伦理学理论体系不断完善,新学科不断出现,并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四个现代化中取得重大成就的时期。以邓小平南巡讲话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确立为契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攻坚和关键的阶段。这一时期的伦理学研究以主动适应时代和社会发展的要求、更新理论体系和面向市场经济为其作伦理的论证的新形象出现在中国的学术舞台上,推出了一批有一定理论深度、有相当社会影响的学术著作,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并召开了数十次国际性的学术会议,参与了全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实践性活动,在化理论为德性和用伦理学改造社会凝聚人心等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绩。这一时期伦理学原理的研究呈现出日趋深入精进并多有理论创新的特点。唐凯麟编著的《伦理学教程》,魏英敏主编的《新伦理学教程》,万俊人的《伦理学新论》以及郭广银主编的《伦理学原理》,骆祖望等编著的《伦理学新编》等在伦理学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均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唐凯麟的《伦理学教程》从人存在的二重性入手,将道德区分为社会道德和个体道德两个方面,建构了一个“社会道德——个体道德——社会道德与个体道德的和谐统一”的理论体系。魏英敏主编的《新伦理学教程》一书从对伦理学的类型分析起步,总结和论述中外规范伦理学的历史发展和马克思主义新规范伦理学的革命变革,进而探讨社会道德与个体

道德诸领域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最后归结为人生的不朽与至善,建立了一个角度和内容均有相当新意的理论体系,推动了伦理学原理体系的更新与发展。这一时期,中外伦理思想史的研究方面呈现出由粗疏到精密、由一般性的介绍到深入性的探讨、由实证性的研究到应用性的研究等特点,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中国伦理思想史研究方面,李书有主编的《中国儒家伦理思想史》是第一本专论儒家伦理思想发生发展的通史性著作,唐凯麟、张怀承著的《成人与成圣——儒家伦理道德精粹》从学理的层面批判地总结儒家伦理道德,建立了一个立足于现实审视儒家伦理道德的研究体系。唐凯麟主编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丛书”以三个面向的学术视野和服务现实的学术旨趣集中探讨了儒释道三家伦理道德的当代价值,阐幽发微,颇多新见。此外,樊浩《中国伦理精神的历史建构》,焦国成《中国伦理学通论》等著作也从不同的角度深化着中国伦理学史的研究。西方伦理学史方面,不仅翻译出版了大量伦理学名著和文献资料,而且在深化研究层次、拓宽研究领域等方面多有成就。包利民的《生命与逻辑——希腊伦理思想史论》考源溯流,纵论横议,从前雅典时代的伦理道德一直到希腊化时期的怀疑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斯多亚主义的伦理思想均有深入的探讨与评析。张志祥的《康德的道德世界观》,何怀宏的《契约伦理与社会正义——罗尔斯正义论中的历史与理性》,高国希的《走出伦理困境——麦金太尔道德哲学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研究》等著作,则开创了人物伦理思想研究的新局面。尤为值得称道的是,90年代中国伦理学在面向现实、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研究中成就斐然,实践伦理学和应用伦理学异军突起,取得了十分可观的学术成果。就实践伦理学而言,爱情伦理学、婚姻家庭伦理学、性伦理学、青少年伦理学、职业伦理学、社会公德和普世伦理学的研究如火如荼,龚群的《青年伦理学》,裴烽等人的《妇女伦理学》,王伟、高玉兰的《性伦理学》等大多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创新意义。就应用伦理学而言,更是后来居上,大有引领伦理学发展潮流之势。经济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科技伦理学、生命伦理学、生态伦理学、教育伦理学、宗教伦理学、文化伦理学、国际关系伦理学、新闻伦理学、网

络伦理学、社区伦理学等新学科不断诞生,并且出版了不少令人耳目一新的学术专著,发表了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一些应用伦理学学科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就发展成为热门学科和显学科。以经济伦理学为例,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显示出方兴未艾的发展势头,推出了一大批科研成果。王小锡1994年出版的《中国经济伦理学》从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诸方面探讨经济伦理问题,初步建立了一个经济伦理学的研究框架。1998年他在自己主编的《经济伦理与企业发展》中对之作了进一步的发展,该书分经济伦理、企业伦理、企业管理伦理三编,较好地论述了宏观、中观和微观方面的经济伦理问题。刘光明继80年代的《商业伦理学》之后,在九十年代推出了《经济活动伦理研究》和《经济伦理论》等书,对生产、交换、分配、消费诸领域的伦理问题作了深入的探讨分析。此外,陈泽环的《经济伦理引论》,陆晓禾的《当代经济伦理学漫话》,罗能生的《现代经济伦理研究》,以及乔洪武的《近代西方经济伦理思想研究》等著作,再加上每年数以百计的经济伦理学论文,使中国的经济伦理学研究高潮迭起,有力地推动着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不断向前发展。生态伦理学研究方面也是如此。刘湘溶在九十年代初推出《生态伦理学》一书后,生态伦理学的研究后海先河,惊涛裂岸,李春秋、叶平、余谋昌等人各以自己对人、社会、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对人类发展的使命感责任感为基础,出版了有关环境伦理和生态保护的著作。余谋昌继《惩罚后的觉醒》一书后,于1998年又推出颇具理论深度和实践价值的《生态伦理学》,初步建立了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潮流相结合的生态伦理学学科体系。其他如生命伦理学、网络伦理学、政治伦理学、生物工程伦理学、宗教伦理学等的研究也取得了十分可观的成果,整体上推进着中国伦理学的发展水平,并引起了世界的密切关注或瞩目,为人类伦理学的进步与繁荣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研究新中国50年伦理学的发展历程,总结50年来伦理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系统地研究20世纪中国伦理思想史或现代中国伦理思想史,对促进新世纪中国伦理学的发展和繁荣,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型伦理文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